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

地缘战略
经典译丛

Halford Mackinder

〔英〕哈福德·麦金德著 王鼎杰译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

Halford Mackinder

[英] 哈福德·麦金德 著

王鼎杰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英)

麦金德(Mackinder, H.J.)著;王鼎杰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地缘战略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ISBN 978 - 7 - 208 - 13770 - 7

I. ①民… II. ①麦… ②王…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2741 号

策 划 孙 瑜

责任编辑 龚 权 范 晶

装帧设计 范昊如

本书根据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9 年版译出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

[英]哈福德·麦金德 著 王鼎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146,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770 - 7/D · 2859

定价 38.00 元

前 言

这本书，不管其价值如何，都不是战争时期思想狂热的结果。本书所基于的观点，多在我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中就已提及。1904年，我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曾宣读过一篇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大致描绘了“世界岛”与“心脏地带”的有关图景。1905年，我在《国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和帝国力量中的人力》的文章。我相信这篇文章使得“人力”这一名词流行起来。“人力”这一名词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有战争力，还有生产力，它们是经济论证的焦点，而非财富。

现在我以较长的篇幅来阐述这些主题，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战争已经确立了而不是动摇了我之前的观点。

麦金德

1919年12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前景	1
第二章 社会动量	6
第三章 海上人的观点	29
第四章 陆上人的观点	66
第五章 帝国间的对抗	98
第六章 国家的自由	126
第七章 人的自由	154
第八章 结语	170
附录一 对法国外交部中一件小事的札记 (1919年1月25日)	173
附录二 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	175
译后记	189

第一章

前 景

此前那场吞噬一切的战争的生动细节至今仍充斥在我们的记忆中^①。就算是我们自己早年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与我们之间也好似横亘着一道屏障。但高屋建瓴的时机终于到来，我们必须尝试着把这场漫长的战争看作一个独立的重大事件，将它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瀑流。最近的四年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既是上一个世纪的结局，又是下一个世纪的序幕。在过去，国家间的张力是缓慢积聚的；而如今，就外交辞令而言，已日益“缓和”(détente)。如今，人们极易于相信，仅仅因为疲倦的人们已决心不能再有战争，随之而来的就会是长久的和平。但是国家间的张力会再次积聚，即使起初缓慢；滑铁卢之战后就曾有过一个世代的和平^②。而 1814 年在维也

① 开篇就点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此后全书更频繁围绕这场大战发兴亡之论，空间上横跨全球，时间上连绵千年，颇有大历史之恢宏雄奇。方法上则综合运用了地理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论，在尚无学科化的战略学、国际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的时代，此种综合分析已经走到了传统学科交叉分析的极致。也可以说，一部《民主理想与现实》，就是一部麦金德学说视野下的“一战”反思和“二战”预警。——译者注

② 1815 年 6 月 18 日，复辟后的拿破仑亲率大军，在比利时境内小镇滑铁卢与反法联军展开激战。这次会战最终以拿破仑的惨败告终。此战宣告了拿破仑帝国的彻底覆亡，滑铁卢也成为惨重失败的代名词。——译者注

纳围坐于会议桌旁的外交家们^①,哪个又曾预见到普鲁士日后将会成为世界的威胁呢^②? 我们是否有可能平缓未来历史河床的坡度,从而使其不再出现那样的瀑流? 如果我们希望后世子孙不像我们嘲笑维也纳的外交家的智慧那样嘲笑我们的智慧,这无疑是我们所面临的不折不扣的使命。

在过去四个世纪中,几乎每百年就爆发一场世界战争,这些历史上大的战争都是国家间不均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结果。这种不均衡发展,也不全然是由于某些国家相对于它国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地球表面富源与战略机遇分布不均的产物。换言之,现实中国家间从不存在所谓的机会均等^③。若非全然误解了地理现实的话,我可以进一步断言,海陆分布、富源与自然通道是影响诸帝国发展的重要因素^④,也终将导致单一世界帝国的出现。如果真要实现国际联盟的理想以在未来抑

① 维也纳会议是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在拿破仑逊位后发起并组织的国际和会,目的是为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构建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该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从1814年9月18日延续到1815年6月9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维也纳体系。——译者注

② 麦金德此处所言过于夸张。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奥地利代表梅特涅和法国代表塔列朗均已意识到普、俄将成为未来欧洲动荡的关键因素。所以二人达成妥协,进而获得英国的潜在支持;对战败国法国采取宽大政策,甚至协助法国重新成为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对战胜国的普、俄反处处限制,竭力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并努力将俄国力量导向维持君主制度稳定。维也纳和会所形成的维也纳体系之所以能形成一段长久和平,关键即在于此种远见卓识和巧妙安排。而一场和会,居然由战胜国中最弱一方的代表和战败国的代表共定指针,更堪称外交史上的一大传奇。麦金德此处所言,失之偏颇。——译者注

③ 此处由地球表面富源与战略机遇的分布不均,推导出国家发展的不均衡。可谓兼顾内部发展与外部竞争的精辟分析。今日国人论战略机遇期者,均当细细体会。——译者注

④ 海陆二元分析模式是麦金德的得意创举,海陆分布、富源与自然通道则是具体展开分析的三大着力点,对日后的地缘学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注

止战争,我们也当注意上述地理现实,并采取措施抵消其影响^①。19世纪,在达尔文理论的魔咒下^②,人们逐渐认可,只有那种能调整自身以最好适应天然环境的组织才能存活。而今,在战火考验中重生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人类的胜利终有赖于克服这一纯粹的宿命观念。

社会组织是文明建立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互相提供服务。而文明发展程度越高,劳动分工就越细密,社会组织也越复杂。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伟大而先进的社会必蕴含强劲动量,如果不彻底摧毁社会本身,就无法猛然抑制或改变它的走向。如此,即便在矛盾爆发前许多年,独立观察家们便可预见,由于诸社会发展道路的汇聚,它们之间终将爆发一场冲突。而当历史学家们在描述战争之前,也总会先批评人类的盲目,以致无视危机前的凶兆。但事实却是,一个国民社会像其他“进行中的事业”(going concern)一样^③,在发展之初尚可以根据所向往的事业塑造自己,而当它日趋成熟、特性已定,就无力容纳生存方式上任何大的变

① 此处关于国联理想与地理现实的关系阐述,颇有点睛之妙。本书名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讲的便是民主理想如何在现实局限中相对最佳地落实。此前之学者从此视角讨论国内政治者多,分析国际政治者少。而麦金德的独创之处,不仅在于他将民主理想置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环境中展开分析,更在于他特别标举了地理现实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地缘学说体系中的宗师地位。——译者注

②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年),19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因提出进化论而名留史册。最初,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科学假说,但受到19世纪激进思潮的影响,逐渐发生了“达尔文学说”极端化的趋向,很多学派不仅将假说直接升级为真理,而且突破自然科学的范围,以之指导人类社会的行动,此即麦金德笔下的“达尔文学说的魔咒”。——译者注

③ 这是“going concern”一词在全书中的第一次出现,作者在此处一笔带过,实已为第二章的论述预设了重大伏笔。“Going concern”本是财会术语,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按照既定的目标持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面临清算。但在本书中,作者以之形容现代社会的动态发展。——译者注

更。如今世界各国都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虽然地理上的诱惑仍在，但人类能否尽其高瞻远瞩之力，重新思考各自的发展道路，使之不致在我们子孙的时代中发生冲撞呢？

当我们急于全力排除历史上与“势力均衡”相关的种种观念，将国际联盟的设想捆绑于纯粹的法律观念，岂非多少有些危险？我们的理想是，国家无分大小，都应被当公平对待。正如我们的另一个理想，在人与人之间，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不同，也都应当被公平对待。要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便须动用国家权力，而在国际法未能阻止战争后，我们也意识到，维护国家之间的公平，也需要某种权力，或如律师们所说的某些制裁措施^①。但也正如在国内社会中那样，保障公民间法治的权力极易转化为暴政，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国际权力，使其既能维护大大小小国家之间的相处准则，又不致演变为一种世界暴政？通往这种世界暴政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一国征服其他所有国家；而另一条是那个为强制不法国家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权力本身的堕落。当我们对人类社会进行大规模重新规划之时，也必须注意，制定盗窃法的先定事实是盗窃之技能与行窃之机会。换言之，我们需要如工商业界人士那般，从发展与机遇的现实着眼这重大问题，而非如律师那样，仅仅满足于定义权利和补救措施。

① 此处所并列的两大理想，实为同一理想在有政府环境和无政府环境中的不同体现。在学科化的国际政治学尚未形成之前，此论可谓眼光如炬，可与 E.H. 卡尔之《二十年危机》互勘。但麦金德与卡尔均未能开出学科化之国际政治学，则又与大英帝国无宪法有宪政之特殊传统有关。然二人能在无学科支撑的情况下，分析错综复杂之国际关系如无厚人有间，且有除旧布新之创举，亦在于此种传统赋予的睿智。则得失之间，正为一体两面。英美政治学传统之分合流变，即于此处见其同源异趋。今之论英国学派、美国学派异同者，多着皮相，转为识者所笑。——译者注

在此后的内容中,我将致力于衡量,为诸多历史事件——包含最近四年的历史事件——所验证的,我们星球广袤地表的相对意义。然后借此考虑应如何将我们关于自由的理想,最好地适应“地球家园”中的这些持久现实。但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人类本性表现在所有政治组织形式当中的某种倾向性。

第二章

社会动量^①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②

1789年，头脑清楚的法国人民在智慧之城——巴黎看到一幅愿景，一幅宏大的愿景——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不久法兰西的理想主义就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转而沦入命运的掌控之中，拿破仑^③就是它的化身。拿破仑以其军事效率重建了秩序，但与此同时组织起一个法国强权，这强权赖以存在的基本法则即否定自由。法国革命与法兰西帝国的故事，影响了此后所有的政治思潮；这似一种悲剧，一种古希腊意义上的灾难悲剧，先天存在于革命理想主义特性之中。

① 在经典力学中，动量表示为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是与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相关的物理量，指的是运动物体的作用效果。作者提出社会动量这一概念，以及后文中“进行中的事业”这一概念，皆是为了凸显现代社会在不同方面的特性。——译者注

② 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13:12, 25:29。后引申出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在本书第七章中，作者再次引用这个典故，以抨击现代超级都市的负面效应。——译者注

③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年)，即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法国军事家、政治家。——译者注

因此,时至 1848 年^①,当欧洲各国人民再次处于见证愿景的心境当中时,他们的理想主义具有了更加复杂的性质。民族原则加入到了自由原则之中,以此希望各民族的独立精神可以抵制越位的组织者、从而卫护自由。不幸的是,在那革命的岁月,理想主义这座方舟再次脱锚,一步一步地被命运携卷而去,这次它的化身是俾斯麦^②。俾斯麦用普鲁士式的效率扭曲了日耳曼民族这一新理想,就像拿破仑曾经扭曲了法兰西民族更为单纯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一样。民族理想主义的悲剧已经臻于极致,然而,命定这一结果的,并不是自由带来的无序,而是组织者所信奉的唯物主义,它通常被称为“Kultur”^③。法兰西悲剧是单单的理想主义之崩溃;而日耳曼悲剧,事实上,却是现实主义之陵替。

当 1917 年沙皇制俄国倾覆而共和制美国参战时,整个世界的民主国家都认为它们已经看到了灿烂的港湾灯火。至少在当前,俄国革命走过的是一般性革命道路,但我们仍然寄希望于普世民主。在 18 世纪的自由理想与 19 世纪的民族理想之后,我们又加上了 20 世纪的国际联盟理想^④。如果第三场悲剧也紧随其后,它必将规模浩大,因为已经有更大部分的人类把民主理想作为行事

^① 指 1848 年欧洲革命。此次革命随民族主义大潮而起,波及大部分欧陆国家。——译者注

^②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1815—1898 年),劳恩堡公爵,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71 年),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1871—1890 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缔造过程中的灵魂人物,世人称“铁血宰相”。——译者注

^③ Kultur, 德语“文化”之意,作者使用这一词汇而非 culture,暗示德意志文化有其特殊之处。下文中将统一翻译为“德意志文化”。——译者注

^④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当时人们将之视为国际联盟的理想所在,以及实现永久和平理想的阶梯。这也是本书题目中“民主理想”之直接所指。——译者注

信条。德国人以其现实政治 (real-politik)，即从属于现实的政治——并不仅仅是实用政治，认为这场灾难迟早不可避免。君王和普鲁士的军事阶层，可能仅仅是在为维持他们的权力而作战，但是德国社会中庞大且有知识的阶层是在一种政治哲学的说服下行动的，他们忠于这一信念，并且不会因为我们的否定而削弱半分。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的种种预测在很多方面都被证明是谬误，不过这只是因为我们那几条明智的政治原则，以及不懈的努力，尽管我们的政策也有过失误。我们最艰难的考验尚未到来。如果世界要长久地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之处，需要何种程度的国际重建？而从民主国家的内部结构来看，如果要驾驭那些曾在这场战争中激发出英雄主义的种种理想，使其推动社会重建的重犁，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些问题无比重大。我们的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庄重姻缘，能否玉成呢？

*

*

*

理想主义者是社稷所赖世间之盐^①；没有他们的鞭策，社会很快会停滞，文明也将衰退。然而，理想主义却与两种迥然不同的性情结合。早先的理想主义，如佛教、斯多葛学派和中世纪的基督教，都建立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圣方济各会的修士自誓于贞洁、贫穷和服务。而现代的理想主义，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理想

① 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5:13。盐是农业文明时代主要的食物防腐剂，又是医师手中重要的消炎剂。世间之盐含有阻止世界腐败、救治世间苦难的含义。经文中，耶稣希望信众能做世间之盐、世间之光，此处则被麦金德用来形容理想主义者的宝贵品质。——译者注

主义,却是以自我实现为基础的。它的目标是使每一个人都过上富足和自尊的生活。正如美国《独立宣言》之序文所述,人人生而平等,人被赋予了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理想主义的这两种趋向,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两种发展相对应。在早期,加在人类身上的自然力量仍然很强。严酷的现实抑制了人类的野心。换言之,世界在整体上是贫乏的,屈从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通衢。少数人无疑可以在生活中获得一些富余,但必须以奴役多数人为前提。甚至所谓的雅典民主和柏拉图式乌托邦^①,也都建立在家庭奴隶制和产业奴隶制的基础上。但现代社会是富足的。人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自然力量,而所有的社会阶级,先前曾屈从于天命,如今都浸润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中,即通过对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拥有一条通往机会平等的捷径。

人类掌控自然——这一现代的现实对于民主理想不可或缺,但它并不全然由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发明的进步。人类当下行使的更大掌控是有条件的,并不像自然以饥馑和瘟疫对人类行使的掌控那样绝对。今日人类富裕与相对安全的根基,是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是对那些业已取代原始社会简单工具的复杂工厂之持续维护。现代社会是一种“进行中的事业”,或许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福祉可以与工商业中无形的“声誉”相比拟。工商业主对其顾客的消费习惯的依赖,丝毫不亚于对工厂内机器之有序运转的依赖;两者都必须时常维护,在维护当中它们就都具有了“进行中的事业”的价值;而业务一旦陷于停顿,它们就仅仅具有破碎的价值了,机器变成一堆废铁,声誉沦为债务。

^① 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描绘的乌托邦国家,即以最高尚、最智慧的哲学家为统治者的国家。——译者注

社会之存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人是习惯性动物。通过把人们各种各样的习惯联结在一起，社会获得了一种结构，正如运行中的机器。庞塞太太^①之所以能为房子的居住建立一个简易社会，是因为包克斯晚上休息而考克斯则在白天，可一旦其中一个房客休假，暂时改变了习惯，她的小社会也将因之扰乱。任何人都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他所依赖的那些人，像邮差、铁路工人、屠夫、面包师、印刷工，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突然要变更他们既定的工作轨迹，那么他身上将发生什么？他那时才会感叹，现代人施加于自然的力量，是在何种程度上由于社会是“进行中的事业”，或者用工程师们的话说，是由于社会具有动量。一旦社会停止运行，使人们的习惯如相互咬合的齿轮一一脱节，那么社会很快就会沦入自然的掌控，无穷无尽的人们将因此丧生，这一切都发生得顺理成章。

简单来说，生产力是对于现代文明极为重要的现实因素，远甚于积累的财富。一个文明国家的全部有形财富，尽管其中一些珍宝是历年所积，却大致相当于它不超过七八年的产值。这种说法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精确程度，而在于它对于现代人类急速增加的实践意义；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机器生产的依赖，这机器既指机械也指社会，它在过去四五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变得益加精致和复杂。事实上每一次科学应用的进步，都有社会组织的变革相伴随。当詹姆斯·瓦特^②发明蒸汽机时，亚当·斯密也在讨论劳动分工，

① 庞塞太太、包克斯与考克斯皆是《包克斯与考克斯》(Box & Cox)一剧中的角色，该剧是1866年首演的一部独幕歌剧，在英国风靡一时。——译者注

② 詹姆斯·冯·布雷达·瓦特(James von Breda Watt, 1736—1819年)，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苏格兰著名的发明家和机械工程师。他改良了蒸汽机，奠定了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是工业革命时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汽车、潜艇、飞机的关键——内燃机的发明，竟与信贷制度的空前扩张如影随形，这也绝非偶然。金属机器的润滑有赖于活人的习惯。有些为科学而痴狂的人设想，对于人文艺术的研究已不再重要，这种说法经不起细究；对各个阶层的人进行管理，在现代的现实情况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

我们把管理社会机器的人们称作组织者，但在这广义术语之下通常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首先是管理人，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者，组织者是在有机体中创建新机构的人。管理人的职责，是维护运行中的社会机器并注意其更新换代。当有人去世，或者由于老病而退休，他就有义务用事先经过相应训练的人员填补空位。一项工作的领班，本质上就是一名管理人。法官是法律的管理人，尽管在迄今为止的事实上他或许还能造法（在理论上决不可以）。在管理人的工作当中，没有任何有关改进的概念。如果他管理某个机构，效率就是他的理想，工作要完全得心应手。他典型的弊病，被称为“官僚作风”（red tape）。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复杂社会，由于其动量的特定力量，事实上也趋向于一种中国式的凝滞状态。一家成立已久、经营良好的企业，它的声誉往往能在市场上卖一大笔钱。或许社会动量最显著的例证，可以在市场本身的固定性中看出来。每个商家都希望去买家习惯聚集的地方，以确保能为他的货物找到买主。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的话，每个买家也都会去商家惯常聚集的地方，以便在他们的竞争下可以便宜地购物。伦敦当局多次试图分散市内的市场，但终是徒劳。

为了理解另一种类型的组织者，即社会机器的创造者，让我们

再来研究一下革命的一般性路径。首先，某个“伏尔泰”^①批判所谓“法国政府”的“进行中的事业”；其次，某个“卢梭”^②勾画出一个理想，描绘更加幸福的社会；接着，大百科全书^③的作者们证明这样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确实存在。很快这些新思想吞没了一些善意的狂热者，然而，他们在改变普通人的习惯上缺乏经验，这是一门困难的艺术。他们抓住一个变更法国社会结构的机会。偶然但也不幸的是，他们却放慢了它的运行。罢工、生产器具与政府管理的实际破损、解职经验管理人并以不能胜任的生手取而代之，这一切加在一起，降低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率，而结果就是物价上升，社会信心和信誉下落。革命领导人们无疑情愿贫困一段时间，以实现他们的理想，但千百万饥饿的民众在他们四周奋身而起。为了赢得时间，他们引导民众去猜疑，短缺是由于已黜力量的干扰，然后，大恐怖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最终人们成为了宿命论者，并且遗弃了理想，寻找某个可以恢复效率的组织者。外敌犯境强化其必要性，而且生产量减少和纪律松懈也已经损伤了国家的防御力量。但是重建任务所需的组织者不仅是管理人；他必须有能力设计并制造社会机器，而不仅仅是修复和润滑。因此，“组织了胜利”的卡诺^④和携

①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年)，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译者注。

②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年)，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政论家。——译者注。

③ 大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e)，18世纪中后期法国以狄德罗为首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以编纂《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作为启蒙运动工具，这群学者后被称为大百科全书派。——译者注。

④ 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 1753—1823年)，大革命期间法国共和政府领导者之一，整顿了当时法国的军队，采取了新战术，改善了军队供应，对筑城学颇有贡献，一手主导1792年夏季战局的逆转，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译者注。